

02

碧山

主编 左靖

去国还乡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是中国知识分子

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失败是不算数的。二零二碧山计划杂记

作为社会的一面镜。美浓黄蝶祭的时代脉络

重赏大地的醍醐味。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纪行

黔县百工二

关于芥子园山水卷

从一个血缘村落看宗族制度在宗祠建筑上的体现上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碧山

02

去
国
还
乡

出品

汉室设计管理机构

主编

左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国还乡/左靖主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5
(碧山; 2)

ISBN 978-7-5155-0732-3

I. ①去… II. ①左…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5213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碧山02: 去国还乡

作 者	左 靖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拉 页	1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732-3
定 价	49.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封面字体、本书中目录标题字体由福建宁化木活字传人之一邹建宇手工刻制

风格的文章里，孙云帆始于懊恼但终于饶有兴致地记录了其参与黟县摄影节和碧山丰年庆的「失败」经过，中间看似「走神」的对乡村现象的描述反倒让人眼睛一亮，并在最后不计「前嫌」地和我们分享了美国的经验。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深谙所谓「失败」的缘由。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时运不济的结果，但事实上，这无非是「事有必至」的「理有固然」罢了。我以为，这个结果并非那么坏，从某种意义上，这反倒为我们规避了仪式的烦琐，从而直接切入了自由交流的主题。如果说有缺憾的话，那就是，一堵高墙业已砌就，我们在墙这边，村民在墙那边。当然，这肯定是致命的。

《郝堂素描》和《精神返乡：渠岩和许村的故事》出自潘思雨和梁莉两位尚在高校的青年学子之手。在她俩的笔下，孙君和渠岩，两个对历史文化高度敏感，以及有着一技之长优势的艺术家，他们从事乡村建设的着手点不约而同地是从乡村规划和老屋重建开始的，或许有时你会出现幻觉，我们与村民以及当权者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美学上的分歧。对于孙君和渠岩而言，用符合当地农民和政府思维的语言进行工作，加上当地文化精英的支持，做一个「深入式、扎根式」的乡建工作者，几年下

来，春风化雨，乡村建设完全是一个可为且能来的事业。

本辑文艺乡建的视野还涉及了台湾南部美浓的「黄蝶祭」和日本越后妻有的「大地艺术祭」，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和艺术在乡村重建中的作用与力量。

前面提到的那个「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他叫吴景超，歙县人，我的徽州乡贤。在今天乡村建设似乎也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吴先生，作为梁漱溟先生的对立面，读一读他的书很有益处。但我们不能因为「失望」和「悲观」，就停止脚下的步伐。从本辑文中介绍的那些行动者来看，其实天下事尚可为。认识你脚下的土地，与认识你自己一样重要。成为一位改良主义者的同时，也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位个人主义者。救活乡村，其实就是救活自己。去国还乡，在我看来，正是走在寻找我们传统家园的路上。我们的家园在哪里？最重要的还是在每个有着传统文化精神且富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去国还乡，实际上是在寻找我们自己，只要前仆后继的人还在，我们的家园就不会消亡。

2013年3月10日于北京

整个寒假，我都在读一个人，一本书。套用时下流行的语言，这个人也许可以算得上是『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了。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对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乡村建设，此人指出，『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

虽然，乡村建设的内容并非只有『生计问题』，但他说的基本没错。回顾自上个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历史，不难看出，从早期的山西村制改革，到定县、邹平、徐公桥、无锡等地的实验，再到后来『伟大领袖』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到国内环境出现突变，或是政治人物、政策性导向发生变化而使『运动』戛然而止，整体来说，似乎除了留下一些可资推崇的精神遗产外，所谓的『到农村去』运动实于改变农村本身并无多少建树，有的甚至还给整整一代人带来了灾难。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仍会重蹈先行者的覆辙？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对当下农村的描述，已经从过去的『农村破产』变为『乡村凋敝』。在城乡关系仍旧如此紧张的今天，乡村建设在一边倒的利益诉求下究竟还有多少改良的空间？乡村建设难道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心结吗？

《碧山》准备用两辑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作为统领整个专题的文章，钱理群先生的《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是一篇十多年前的旧文，但文中所述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对于今天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也许钱先生已经预见了几十多年来乡村建设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不管怎样，他所提倡的『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不啻是一种脚踏实地、正视现实的选择。

《失败是不算数的：2012碧山计划杂记》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在这篇多少带有一些《纽约客》

碧山 去国还乡

卷首语 去国还乡。乡关何处

左靖

卷一 专题 去国还乡 001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

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

失败是不算数的。二零一二碧山计划杂记

郝堂素描

精神返乡。渠岩与许村的故事

钱理群
孙云帆
潘恩雨
梁莉

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

阮义忠

作为社会的一面镜。美浓黄蝶祭的时代脉络

刘逸姿

重尝大地的酸酣味。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纪行

林小熏

碧山刻记

刘庆元

卷二 行动民艺 121

黟县百工二

王玲玲

卷三 传承与表现 135

关于芥子园山水卷

徐冰

二十四节气·时与地^①

邱志杰

卷四 乡土建筑与保护 151

从一个血缘村落看宗族制度在宗祠建筑上的体现^②

李秋香

家庭式实践·庆兴楼保护发展的循序渐进之道

徐轶婧

卷五 故土残调 199

谁的钟鼓楼

宋壮壮

卷六 读影 213

镜头敲开记忆之门

吴文光

卷七 品书 221

这个世界会好吗·如何完成的

艾恺

卷一 专题 去国还乡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

失败是不算数的。二零二碧山计划杂记

郝堂素描

精神返乡。渠岩与许村的故事

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

作为社会的一面镜。美浓黄蝶祭的时代脉络

重尝大地的醍醐味。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纪行

碧山刻记

钱理群

孙云帆

潘思雨

梁莉

阮义忠

刘逸姿

林小熏

刘庆元

编者按

本文是钱理群先生2001年11月为“西部阳光行动”青年志愿者进行的一场讲座的谈话稿。文章重点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五次“到农村去”的运动。钱先生在文中点出，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农村更甚于中国农村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前往农村真正的内在动因，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而必须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代代下乡，农村落后与贫穷的状况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征得钱先生同意，文章收入《碧山02》。由于原文较长，限于篇幅，本刊进行了删节，敬请作者和读者原谅。

也许是因为我研究现代文学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看到诸位，就觉得似曾相识。你们的言谈，说话的姿势，眼神里流露出的热情与困惑，初到农村时的惊喜，第一次走进农民的小屋不知如何交谈的窘态，工作无法深入时的焦虑与无休止的竞争，平静下来的自我反思与质疑等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而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这里有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到农村去”的运动。

“五四”的先驱者是第一代；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与乡村建设派是第二代；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第三代；建国后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第四代；“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是第五代；而今天的你们，是第六代。我们不得不思考，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这是为什么？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知识分子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



一、一个世纪五代人的“下乡运动”

（一）“五四”时期：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和新村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肯定。鲁迅后来曾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在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五四”的先驱者们已经意识到，农民不是“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要求的独立的“人”。

而从民族解放的角度来理解农民解放的代表是李大钊。他在《青年与农村》中指出，作为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如果不解放，就是国民全体不解放，而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社会，知识阶级就要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由此他发出“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并在文中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条，是农村黑暗的现状。“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就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哪个的责任？”

而第二个理由，在于立宪。“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

左

1932年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介绍了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与一些人的《新村运动》。同年七月，周作人赴日参观新村，并成为会员。回国后竭力推崇新村运动，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以新村为榜样，发起组织了工读互助团。

中

武者小路实笃（1895—1972），日本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白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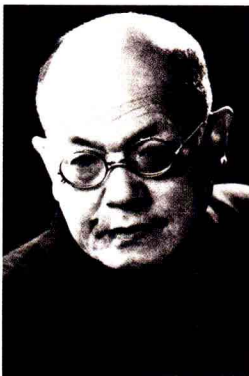
右

日本新村运动的发起者武者小路实笃被《新村》杂志介绍到国内。

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如果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没有自由的判断力，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的诡诈的手段”的城市流氓，那些“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那有丝毫的希望？”

再来看他的第三条理由，是乡村的幸福。他说，“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城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有许多幸福……城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李大钊对农村的理想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感，同时也受到了抛弃家庭幸福，跑到乡下农村宣传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俄国民粹派的影响。俄国民粹派对中国“到农村去”运动有积极的影响，但其也造成了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

而这种理想化，也体现在当时另一个重要思潮，即所谓





上 1916年晏阳初在纽约寓所留影
中 留学归来的晏阳初骑驴下乡
下 晏阳初编写的农民识字教材《农民千字课》

“新村运动”上。“新村运动”希望在农村建造乌托邦的“新村”，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过着一种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新生活。大概在1918年，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日向建立了这样的新村；1919年周作人去参观后，在国内大肆鼓吹，得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许多青年学生的响应，后在北京组织了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也是新村运动的热心者，他曾为此专门访问过周作人，还亲自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

新村运动的理想的核心，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健全的“人的生活”；而所谓健全的“人的生活”，就是个体的人与人类、社会的人的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农民沐浴在大自然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生活，对当时沉浸于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李大钊这一代人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二）三十年代：“分田分地真忙”和“乡村建设运动”

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的倡导与小规模的试验上，但到了三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农村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

“到农村去”开始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

首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必须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而农村问题的根本也是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变革必须从土地改革入手，改变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大多数农民则无地或少地的状况；中国的革命又

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 风云
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
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必须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的变革为全国变革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出现了毛泽东诗词里所描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其次，与此同时，一部分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在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因此，需要进行四大教育。分别是关注于设立学校、扫除文盲的“文艺教育”，关注农村经济发展的“生计教育”，关注健康的“卫生教育”以及建立地方自治基础的“公民教育”。他强调，这四大教育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与改造，而“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才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为了实现这样的理念，他提出了“博士下乡”的口号，带领一批年轻人在河北定县等地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

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力推动者，但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重建民族新文化。具体到乡村建设，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礼俗，并在农村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梁漱溟带领了一批知识分子，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开辟了邹平、



菏泽、济宁等实验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六百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一千余处。后来，都因抗日战争爆发，实验区为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告终。

（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下乡运动”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当毛泽东进一步呼吁“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以致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时，其实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的。人们感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命令，同时也是通过自身的痛苦经验而发自内心的要求。因为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知识分子尤其容易产生软弱无力感，这时候就迫切地要求寻找归宿，中国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就自然成为战争中处于生活与精神双重流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皈依之乡。于是，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走向农村，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这一运动与二三十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自然有深刻的联系，但也有不同之处；除了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与发动的，是一个政府行为之外，最主要的是，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上，发生了微妙的移动：由“启



梁漱溟（一九〇一—一九八八），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蒙、被启蒙”逐渐转换为“受教育、教育”，“到民间去”的“启蒙”主题逐渐变成了“改造”主题。特别是当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把改造命题推向极端，宣布“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把前面说到的美化农民与农村的民粹主义的倾向，发展到了极端。而当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而“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者也”，这就实际上意味着要用农民的意识来改造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从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但知识分子在下乡过程中也加深了对中国农民、农村，以及整个中国国情的了解，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农村的建设事业的发展。

（四）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其国家体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因此，国家的教育、文化、卫生等政策都倾向农村，使得五六十年代农村建设有了全面发展。当然，毛泽东按照他的乌托邦的社

梁漱溟与毛泽东
二〇五年
延安



会理想（这一理想是前述“五四”时期所建立的“新村运动”理想的一个发展），在同时期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也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是需要另作讨论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建设祖国与自我改造这两大理念，使得我们年轻时最大的志向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农村就是这样一个广阔天地。但无可否认，这背后存在着“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的理念，暴露了我们这一代人自觉或不自觉充当了“驯服工具”的问题。在大学毕业时，当组织上分配我到边远山区贵州去时，尽管这多少有点惩罚的意味（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又走“白专道路”），但我仍是欣然前往的。因为这是党的安排，同时想的是“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后来，我并没有分到农村最底层，而是在专区所在地的安顺教书。但一教就教了十八年，正是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中国的社会底层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说句夸张的话，我是与底层老百姓一起经受磨难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深切的了解，这几乎决定了我以后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尽管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海报

下
196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未恢复高考以后，离开了贵州，来到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但我始终以贵州作为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精神联系。

（五）“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半自愿、半被迫地到农村去的。这是上一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说得很明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是有着浓厚的反智